

YIDALIZOUXIANG

SHEHUIZHUYI



DEDAOLU

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波利塔诺答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包姆问

4. 64
02

浙江人民出版社

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波利塔诺答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包姆问

刘芸影 吴克良译

吴章彬校

浙江人民出版社

The Italian Road To Socialism
An Interview by Eric Hobsbawn with
Giorgio Napolitano of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根据英国 Lawrence Hill & company
一九七七年英译本译出

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波利塔诺答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包姆问

刘芸影 吴克良译

吴章彬校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125 字数 68,000

1981年10月第 一 版

198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200

统一书号：3103·179

定 价：0.26 元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它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译者说明

有着长期的多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当通过什么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是迄今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还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欧洲共产主义”就是意大利等一些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在探索这条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思潮。

本书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包姆访问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那波利塔诺的谈话记录。那波利塔诺是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成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也是意共的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的权威。在这篇访问记中，他以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回答了有关意共的路线和对内对外政策、“历史性妥协”的战略以及意共对美国 and 苏联的态度等许多问题。这对于我们了解意大利共产党当前进行的斗争和“欧洲共产主义”道路，很有参考价值。

本书是根据英国劳伦斯·希尔公司一九七七年出版的英译本翻译的。

一九八一年四月

原出版者的话

《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享有国际声望的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包姆访问意大利共产党经济问题发言人乔治·那波利塔诺的谈话汇编。第一次谈话时间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二日在罗马。霍布斯包姆和那波利塔诺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九日再次在伦敦交谈。这份材料把第二次谈话同第一次谈话合并在一起，刷新了第一次谈话的内容。

本书集中论述西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大的政治发展——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书中提出的问题是：

- 新的政治现实如何影响美国同意大利的关系？
- 一九七六年的意大利大选有什么重要意义？
- 什么是“历史性妥协”？
- 意共首先效忠于莫斯科还是效忠于意大利和北约组织？
- 意共提出什么样的经济纲领，党如何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工作？
- 意大利共产党今天的实力有多大？

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波利塔诺答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包姆问

—

埃里克·霍布斯包姆（以下简称霍）：在开始以前，我想问一件事：你是否以意共书记处书记的身分回答我的提问？可否请你澄清这一点？

乔治·那波利塔诺（以下简称那）：我并不总是代表党讲话。自然，我将尽量考虑我们集体所做的一切，但我首先将努力根据党内我这一代人的经验来回答你的问题。

霍：好，那末我们就从你的个人经历谈起。看来这样做很有好处。你是怎样参加共产党的？思想上起过哪些变化？

那：我是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间参加共产党的。我刚进大学时，正值法西斯统治的最后危机时刻，我已经“发现了”共产党，但当时我的主要倾向还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意共奠定了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党的基础。在北方是通过抵抗运动——解放战争的烈火奠定的。在意大利南方（这一点值得强调一下），这一进程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实现的。不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来自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知识界的青年也参加了共产党。在意大利南方，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有扎实的政治和精神基础的，是同法西斯垮台以及盟军解放这一地区之后的形势密切关联的。

对于我们这些在那不勒斯或其它南方地区参加共产党的人来说，党首先是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支最不妥协的力量。当时党在游击运动中站在抵抗斗争的最前列。即使在南方，党已经参加了政府，它仍一直在进行斗争，推动大家团结一致，为解放仍被纳粹占领的意大利北方而战。由于意大利共产党是以苏联为首的伟大世界运动的一部分，它的形象就更为突出。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苏联进攻纳粹军队所取得的英勇业绩和辉煌胜利，具有巨大的和非凡的吸引力。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认为我们参加意共的最重要的原因，应当说是由于共产党在力求解决法西斯遗留下来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在南方）方面所起的作用。

霍：意共对这些问题采取什么对策？

那：人们确实应当好好地回忆一下一九四四年陶里亚蒂返回意大利时那不勒斯及南方的局面。几年后陶里亚蒂写过一篇十分精采的证词，叙述当时那不勒斯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个城市已经四分五裂，集南方一切落后因素之大成，到处是战争造成的废墟，一片荒芜景象，极其触目惊心。

在政治上如此落后的南方，怎样才能使局面改观呢？在北方，劳工运动经过抵抗运动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地位；而在南方，不论是城市（甚至象那不勒斯那样的大城市）还是在农村，反动势力的影响仍占统治地位。在我们许多人的心目中，共产党是最能保证实现彻底变革、同时又为解放和重建我国而实现最广泛团结的一支力量。在南方看来，它最有条件着手改革，在政治与社会方面进行恢复工作和促进广大人民群众逐步提高觉悟。意共本着这样的前景和目标，一俟陶里亚蒂返回意大利后（多亏他给意大利政治指出方向），就担负起政府职责。

我们同时感到个人也需要全力投入重建和革新工作，这在当时那不勒斯和南方的条件下是十分艰巨的。当时有许多年轻人象我一样，来自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知识界，他们感到必须抛开个人打算，以及在文化或专业上的抱负，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工人阶级政党。这就是我们靠拢意共的政治和精神基础，至于思想修养则是以后的事了。

霍：南方青年是如何接受意大利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都灵传统”^①的呢？

那：党内一些经过考验的第一流领导人，过去也是南方的青年知识分子，可以说起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们有过反法西斯斗争的经历，坐过牢，被流放并流亡国外。这些经历使这批青年人同那些出身工人阶级、具有“都灵传统”的领导人在组织上结合在一起。我指的是象乔治·阿门多拉和艾米利奥·塞仑尼这样的人。北方一解放，他们就负责党在意大利南方的活动。他们无疑是新一代南方共产党人和党的全国领导人之间特别重要的纽带。党的全国领导人当时多半仍扎根于象你所说的“都灵经验”之中，他们是葛兰西^②在都灵培养出来

①“都灵传统”或“都灵经验”，是指1919—1920年意大利都灵市工人，在葛兰西等人领导下进行工厂和成立工厂委员会的运动（参见本页关于葛兰西的注）。——译者

②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1913年，葛兰西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7年当选为都灵社会党总支部书记。十月革命以后，他吸取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在意大利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1920年领导都灵工厂苏维埃的革命运动，并创办了《新秩序报》，后来就在该报周围形成了社会党内的共产主义派别——“新秩序派”。1921年，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等共产主义者在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而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1922年，葛兰西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6年，他被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逮捕，监禁达十一年之久，备受折磨，出狱不久即病逝。葛兰西在其战斗的一生中，著有不少重要著作，最有代表性的当推《狱中札记》一书。葛兰西的思想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方针路线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当前“欧洲共产主义”思潮也有很大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欧美不少国家出现了研究葛兰西著作的热潮。——译者

的。

应该说，在陶里亚蒂领导下的全党领导（他们一部分人解放战争时期在北方工作，一部分人则已经到了南方）是吸引我们和鼓舞我们的信心的巨大源泉；我们对它几乎达到盲目崇拜的地步。它代表了共产党人在历史上反法西斯斗争（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欧洲）的献身精神。同时，它也表明意大利共产党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血肉关系。

霍：你说你的思想修养是入党之后才开始的。我看这完全合乎常理。一般总是先在政治上入党，然后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提高。

那：另一方面，在三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在秘密入党之前，在理论上就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我特别是指罗马的一批人，我能回忆起来的有路契欧·隆巴多·拉迪切，阿尔多·纳拉利，保罗·布法利尼以及后来的马里奥·阿利卡塔，皮特罗·英格拉奥。努力在思想上同党同心同德也是入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则是在一种十分激动人心的形势下参加党的，是在感情比较冲动的情况下参加党的。

霍：你入党后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有哪些发展阶段？

那：我应该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上“工人阶级学校”。现在这么说可能象是讲漂亮话，但当时在那不勒斯这样的城市，党的核心确实是工人干部。对我们来说，这的确是个相当严格的学校。我们的主要活动是学习在工作中遵守纪律，了解工人阶级的问题和劳工运动的问题，使我们能够成为能干的政治干部。我可以说，我们当中许多人是谦虚认真地根据这种要求而努力的。

至于谈到我们思想文化方面的修养，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我是指党多年来在这方面的一贯立场而言。党基本上要求

我们在两个不同的领域进行工作。一个是同传统文化，特别是同传统的南方文化建立联系，既同这种文化的进步方面建立联系（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要求建立这种联系），也同这种文化的更复杂的理论方面建立联系。对于后者，我们需要采取严格的批判态度。其次是意大利的历史、南方的历史和意大利的文化传统。葛兰西的《书信集》和《狱中札记》出版之后，我们从中得益非浅，受到很大鼓舞。

我们的另一项任务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那就是学院式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特别是学习马列主义最刻板 and 简单化的解释，著名的课本有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布）党史》等。

因此，在党的文化工作中，从而在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和文化教育中，同时存在着两种大不相同的活动。不过也要承认，我们这些较年轻的党员，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两种文化教育存在着矛盾。实际上我们察觉到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过了好久以后，是在批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主义的歪曲和批评斯大林主义时期在文化政策上阻止发展的典型作法之后。

霍：到现在为止，我们着重谈的是解放斗争时期，因为以这个时期为起点，对意共进行分析是合乎逻辑的。不过我认为党在这个时期之前的历史并不是一脉相承的，但在解放以后，它的发展基本上是连贯的。在回顾意共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发展情况之前，先谈谈这样一个问题看来是重要的，即：你和你这一代人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入党时，究竟有哪些历史遗产、具体形势和经验影响党的发展。

那：我同意你的意见，回顾一下形成意共和当时政策的历史过程是很重要的。强调一下在法西斯垮台后立即出现的一个特殊方面是正确的（我这样作是把这方面看成是意共的一个

基本特点)。意共是作为一支主要的民主力量、自由和民主的真正价值观念的捍卫者出现的。尽管其它政治力量和主要思想派别怀疑共产党的民主性质，或者怀疑它的民主任务的真诚性，但我们知道，它已经在事实上表明了它的信仰和它以最有效的方式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作出贡献的能力。

然而，那时候我们并不完全意识到，要使共产党成为争取自由和民主斗争的最坚定的捍卫者，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

霍：对不起，打断你一下。自由和民主是美好的，但是你们当时想的不也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吗？

那：在那个年代象我这样加入共产党的青年人，没有一个怀疑最终目标应当是社会主义，应当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变革。但是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的近期目标看来是解放仍在纳粹占领下的北方，在这之后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我们要求建立一个进一步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和变革的民主政权（陶里亚蒂称之为进步的民主政权）。不过我还要再说一下，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而是过了好长时间以后才懂得争取进步的民主政权这一近期目标有多么困难。也许这是一个你所感兴趣的问题。

霍：是的，这恰恰是我的问题所在。

那：意大利共产党是各国共产党中第一个被迫同法西斯对抗、切身体验劳工运动败在法西斯手中的滋味，并且不得不从事长期艰巨的探索，以寻求反法西斯的有效斗争形式。我认为当时的那种特殊历史环境对意共和它以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好几年，只有意共一家饱经沧桑，虽然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讨论的一个议题。意大利共产党是第一个被迫经受这种可怕的经历并留下了痕迹。即使今天，要是不回顾意共的历史，我们就无法懂得为什么意共与众

不同。它曾经不得不同法西斯进行较量。

只是到了三十年代，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斗争的问题才成为整个欧洲的普遍问题。我们知道，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共产国际内部进行过多次复杂的争论。在著名的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共产国际内部早就存在着相反的立场。而在意大利党内，可以说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期间，对于劳工运动受挫于法西斯的问题已经有一些十分重要的看法。

霍：可能我们这里谈到的不单是被法西斯挫败的问题，而且是双重挫折的问题。早些时候，在占领工厂时期，革命前景就已消失。战后时期，意大利的政局在西欧是最富有戏剧性之一，意大利劳工运动则是这一政局的不幸后果的具体受害者。

那：事实表明，葛兰西一九二〇年的预言是正确的。他认为要么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找到一条出路，要么是有产阶级的“强烈反应”。革命运动的低潮和被法西斯挫败这两件事情是密切相关的。葛兰西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期间回顾了前些年的经验，他一方面探索革命运动低落（令人痛心而又倒退到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的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探索法西斯得胜的原因。他在那些年里已经开始找出一条克服宗派主义和公式化错误的路线，宗派主义和公式化的错误有助于法西斯的胜利。他就这些主题进行的思考和探索持续了许多年。不论是葛兰西在狱中的著作还是党在意大利国内外进行的工作，都在这些方面有所发展，逐渐制订出今后可以避免新的挫折、首先是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战线去击败法西斯的道路。

霍：你们是怎样找到这条道路的呢？

那：经过共产国际内部极其对立和激烈的讨论之后，第七次代表大会选择了实现反法西斯力量的最广泛团结的路线。这

次会上，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明确表示了全力支持保卫一切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必要性。最后，以西班牙共和国的经验为依据，共产党人（特别是陶里亚蒂）提出了一个“新型民主制度”的前景。

发展这样一个前景何以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它为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这个问题是：反法西斯斗争的目标究竟是象社会民主主义力量所希望的那样恢复资产阶级民主（这是各国共产党对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指责），还是象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政治上最拘谨的时期所主张的那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人为的难题曾经使争取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特别是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团结起来所作的努力化为泡影。新前景的提出使意大利共产党和陶里亚蒂得以解决这个人为的难题。这个新前景就是：反法西斯斗争的目标既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单纯恢复资产阶级民主。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政权，克服法西斯统治前的那种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根本缺陷，并且为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深刻改革开辟可能性。

霍：现在你接触到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你所提到的新型民主制度的理论，并不仅仅限于意大利的前景。英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七大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当然意大利人的经验（他们对法西斯制度的分析，他们对葛兰西称之为阵地战而非运动战问题的发挥），这一切都使意大利共产党的思想和斗争对于发展这一前景所作出的贡献比其它国家的贡献更为突出。

我不知道意大利的客观形势中是否还有什么其它东西有助于使意大利共产党起那么重要的作用。总之，意大利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是否可以这样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意大利既不属于第三世界，也不属于

第一世界。

那：我想意大利作为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历史条件，当然会有助于推动意大利共产党强调有关民主革命的问题。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早在党被宣布非法以前，在有关南方问题和农民问题等基本方面所作的工作就够了。不管怎样，我们确实是不断地、有意识地从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仍然顽固地存在着前资本主义残余的历史事实出发，努力开辟这样的前景，把争取民主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甚至在五十年代初（由于开展了使南方获得新生的统一人民运动），我们有一些党员还认为意大利南方斗争的目标只不过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已。这种观点受到了那些主要在南方从事党的工作和为争取改革南方而斗争的同志的质问，我认为质问得对。另一方面，在抵抗运动结束后，甚至就在抵抗运动高潮时期，我们当中有些人曾经强调，意大利正在进行民主革命，应当鼓励这种革命，而不应当把它限止在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框框里。当时主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这种民主性质的变革和革新很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霍：不过当时在有关民主问题上作了明确的区分的。当时的思想肯定是恢复民主和发扬民主，而不是倒退到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的进化论上去。

那：不止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愿意再提一下意共经验中另一个具有特点的东西，这将有助于说明意共为开辟全欧共产主义运动新前景所作的特别突出的贡献。我特别是指它在分析法西斯制度及其阶级性质和基本特点方面的发展。从这些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看法，即：必须铲除法西斯主义的根基，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根基。这一看法在推动民主辩论方面变得很重要，我们所讲的一个新型的民主制度，不只是恢复法西

斯统治以前的那种民主制度，不只是指法西斯统治以前的民主制度所具有的那种通过议会逐步演变的弊病，而且是指需要赋予民主制度先进的经济和社会内容。首先，我们想要通过结构改革、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广泛改革，建立起铲除法西斯主义根基的经济制度，从而避免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同法西斯统治以前的民主制度作比较，这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型民主制度的主要的、突出的特点。

霍：这就把我们引到有关战后共产党的战略问题。你讲到必须通过结构改革铲除和摧毁法西斯制度的基础以避免退回到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导致法西斯的产生。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那：意共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起，新制订了一系列的改革计划。第一项就是土地改革，打击的是大土地所有者的财产，特别是侨居外地的大庄园主。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当时所谓的“工业改革”，设想以加强民主国家在经济计划方面的作用来限制大垄断资本集团的权力。那时，我们也努力发展新的群众参与形式并且促成一种使劳动人民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团结、活动更加多样化的民主组织。我们的主要考虑是既要防止再次出现使反动势力得以重新组织起来和取得主动的政治和社会风气，也要破坏旧统治阶级的权势，防止它们重建足以发动法西斯反动攻势的基础。

霍：你们是如何解决群众的民主组织问题的？

那：首先是同法西斯遗留下的东西决裂，并且将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引向自由和真正参与(管理)的原则。最近，党的档案部门公布了一九四四年头几个月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人士为建立统一的工会联合会在罗马(当时仍在纳粹占领下)进行谈判的文件。朱塞佩·迪·维多里奥代表我们党进行谈

判，他遭到社会党人的反对，也遭到天主教人士的反对，后者主张在新的民主制度下保持由法西斯合法建立的单一的强制性工会。他们所关心的是通过强迫参加工会和自动缴纳会费来增加会员人数和工会权力。今天任何人读一读这些文件，都会对迪·维多里奥抨击上述主张的权威性（虽然还不能说是激烈的）发言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赞扬和强调工人经过二十年的可憎限制之后“需要自由”，他认为合法的强制性工会将会是一个官僚主义机构，“拥有大量金钱，设立许多办事机构并雇佣大量人员”，却“为工人阶级所厌恶”。他提出需要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工会，“把主要倡议权和权力交给群众”。他的这条路线由一九四四年六月罗马公约予以确认并成为在自由意大利建立统一的工会联合会的基础。

当然，不言而喻，贯彻这条路线是有巨大困难的。许多年来，自由地建立和巩固群众性工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尤其在南方某些地区。但是根据群众的民主倡议权建立组织的思想，曾经是，现在仍是，防止法西斯卷土重来和建立一个新型民主制度的关键之一。如果我们还想使用三十年前的一个词，那就是进步的民主制度，即：超出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范围的民主制度。当然，它还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基础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变革。

霍：那么，当时你们是在力图为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建立基础。不过你们是怎样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呢？你们是否把这种过渡看成是个长期的过程？

那：毫无疑问它是个长期的过程。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完全不是我们所设想的前景。即使我们当中那些正当北方在进行激烈的解放战争时入党的人，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

霍：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当时有一种批评意见，是根据